

並非游戏

刘 祖 培



云南人民出版社



BL45122

I247.7
490
3

刘祖培

并非游戏

云南人民出版社

A 853430

责任编辑：唐振华
封面设计：贾国中

并非游戏

刘祖培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张 6.5 字数 130.000
1981年11月第一版 1981年11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16·883 定价：0.48元

内 容 提 要

《并非游戏》共收集我省中年作家刘祖培历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十三篇。

刘祖培同志六十年代在部队工作，集子中所选《山林曲》等八篇小说，反映的是边防部队生活，这些小说文笔清新，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边疆民族色彩；所选《并非游戏》等五篇，是作者近几年反映现实生活的新作，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艺术功力的进展和日趋娴熟。

目	面向大地的人..... 1
	并非游戏..... 25
	责 任..... 47
	难消的积雪..... 64
	泼 水 节..... 83
	澜 沧 江 上..... 97
录	山 · 林 曲.....110
	对 手 之 间.....127
	浪 滔 滔.....139
	闪光的日子.....157
	湖 上 霞 光.....169
	将 军 令.....179
	一支没唱完的歌.....193

面向大地的人

一别十年，我几乎认不出这个地方来了。

脚下这条铺着白沙的平直的大路，难道就是当初那股七弯八扭的黄泥小道？从前一刮风便灰土满天的荒坡，绿茸茸，一望无边，一群群催膘待耕的水牛，悠闲地在漫坡上低头啃草，使进入这个小山湾的外客，不需向村人问路，便晓得自己身临什么所在了。不知什么时候栽下的翠茵茵的柏枝，鲜亮亮的大叶桉，绿葱葱的棵松，顺坡势站成弯弯曲曲的三列横队，象幼儿园里的娃娃，手牵手地在山风伴奏下唱着一首春的组曲。坡那面那座古老殿堂的高翘的屋脊怎么不再看见？是被小树林子遮去，还是我寻找错了方向？都不是。它已被一幢灰蓝色的高大建筑物取代了。这新的建筑物的式样，颇象一艘航船，有起伏的客轮，也有高高的塔楼；那一排排树便是它的围栏；而半面草坡，则是它宽阔的甲板……

那么，这艘航船在向何处行驶呢？你看那甲板的下面，不正闪现出一片碧绿的波涛吗？当然，那不是真的海水，而是一片片在春风里抖擞精神向上竟长着的碧绿的秧苗。

周围的环境全都变了，只有这些秧苗没有改变模样。不

用打听，我一眼便能看出它们肯定是老常同志的××代骄子（看那田中栽满的密密麻麻的木牌便能知道）。我是为它们而来的。因为有了它们，我们专区的二十多万亩水稻才大面积平均亩产一千一百多斤；老常才第一个被行署授予总农艺师的称号；地委宣传部才派我下来整理这位遐迩闻名的良种专家的材料；我也才有这个机会在一别十年之后，重新踏进这个山环水抱的令人神往的地方——牛恋坡农业科学研究所。

呵呵！农科所——牛恋坡——常背锅（实在不敬，这是老所长常乐耕同志的绰号，挂在农民们嘴上几十年了，他本人早已认可，我便只好从俗）。这绕口令般的三组名词，象三个纺锭不停地在我记忆的纺车上旋转，使我又牵着时间的经纬，倒退回到那个痴狂的年代，去追忆和忏悔自己因幼稚、无知和虔诚所干下的一桩桩历史的闹剧。

记不清确切的月份了。只记得凭着三代血统工人出身的优越条件和红卫兵扫‘四旧’时立下的那分功勋，我被选拔到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里，打着红旗，举着宝像，高唱语录歌，浩浩荡荡地开进只有八个人的牛恋坡农科所，对那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黑窝，实行无产阶级的全面占领。不消说，进所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宣布“一切权力归工宣队”。紧接着的第二个革命步骤，是开展革命大批判。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那个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农科所的所长罗！

为了造成声势，队长决定把批判会移到牛恋坡上去召开，并且通知周围两个大队的贫下中农都来参加，以显示工农联盟的强大威力。开会这天，坡上坡下，果然人山人海。

各式各样的语录牌，各种各类的像章，琳琅满目，灿烂辉煌，无一不显示出革命群众的革命热情之汹涌澎湃。莫说坐在主席台正中的队长脸上红光满面，象刚喝了半斤茅台；就连我这个会议记录员（因为在工宣队里数我文化最高，自然该掌握这“革命两杆子”里的一杆子）也感到无比光彩，觉得只要把批判大会一开，一个红彤彤的比幻想中的桃花源更美好千万倍的新世纪便会在震天的革命口号中诞生！

十点正——队长本来决定大会九点准时召开，但农民们的散漫性顺延了这个决定——大会开始，主席（自然是我们队长）作了开宗明义的简短致词后，把麦克风吹了一下，提起丹田之气大声宣布：

“把走资派押上来！”

台下，蜂子营巢的嗡嗡声突然静止了，上千双农民的眼睛盯在一个头戴白纸糊的高帽、弯腰驼背的人影上；当他在两支枪口的监视下站在台口垂头而立时，一阵窃窃的耳语象蝗虫咬嚼稻谷般迅速在人群中蔓延开来——

“啧啧！咋个会是老常？”

“背锅犯了哪样法。要戴地主的高帽子？”

“人家虽然当所长，一年四季还不是和我们一样的泥脚杆？”

“瞧他，又黑又瘦，好可怜……”

“自古讲，好人多磨难啊！”

“唉！说不得，说不得。”

“背时的日子！早晓得开这种会，老子还不如……”

这样的话，东一句西一句传进我的耳朵，增加了我对眼

前这个走资派的愤慨（他肯定用什么狡猾的手段拢络了我们的同盟军），我不由得瞪大两眼，想通过他的外形，看进他的灵魂里去。可这一看，我倒有些泄气了。这个资产阶级权威，如果头上没有插着那个异己阶级的标签，不论在哪里碰到，我决不会把他当成比保守的老农更时髦半级以上的人物：一张平板俗气的长脸，皮肤色黑而粗糙，额头上起码排列着十六条皱纹（天知道，我为什么想到这个数字）；鼻梁上倒是架着一副近视眼镜，但看那古老的式样，它的出生年月决不会超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他眼望着地面，看不出眼珠是什么颜色，但从他的脸色推断，我相信它一定也是黑中带黄，决闪不出什么智慧的光芒；他的嘴唇上不但没有漂亮的两撇，反而光滑皱瘪得象个老太婆。上是一件老农们常穿的千篇一律的对襟黑棉袄；下是一条青布单裤，裤裆肥大，一支裤脚卷过膝盖，另一支则只卷到脚踝上边。细瘦而多毛的脚，插在两支军用胶鞋里，由于泥土的作用，鞋面那绿色几乎都变成了一片赤红，颇有点投机革命的嫌疑。而最突出的，还是他那两个隆起的肩胛，早已超过了他那微垂的头顶；这便是他虽有大号，人们只直呼背锅的来由了吧？

望着他这副仪表，我心里真有点泄气，好比想打豹子的人只遇见松鼠。但当我想起首长们关于“资产阶级最善于伪装”的教导时，立即又坚定起立场，把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桩桩罪状照实录下来。遗憾的是发言人所使用的语言都惊人地雷同，差不多都是报纸社论上讲过的。我那写着写着 的笔，慢慢地便没有什么劲了……

大会从上午十点开到下午两点半，便只能算为小会了。

这是老天帮忙的结果。想想看，谁能在大太阳底下一动不动地坐四个半小时呢？农民们在荒坡上找不到一片阴凉，胆大的一个个溜了号，不敢走的便三五成群挨在一起，把语录牌遮在头上当阳伞，在大喇叭嗡嗡的催眠声中打瞌睡……主席团的人也都被烤得汗流浹背，但为了革命的尊严，又只能正襟危坐。我最耽心的是台口驮着背站着的那位“主角”，怕他老小子什么时候晕倒了，一头子栽下去，破坏了目前仍应视为良好的会场秩序。然而事实却出乎我的意料，他尽管半件棉袄都浸透了汗水，黄豆大的汗珠子落在鞋面上一摔八瓣，但他一直立得稳稳的，没有任何不良的预兆。我简直有点忌妒他的坚强（或者愤恨他的顽固）了。

会议散场，队长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暂时解除了对常背锅的武装监押，给他以有限的自由。只用眼色暗示我进行盯梢，以防他去寻短见（因为在别的地方发生过类似事件）。

常背锅驼着背从台上下来（生理的和心理的因素都不允许他挺起胸膛），把高帽子小心地夹在胳肢窝下，用二百米的冲刺速度朝坡脚跑去，跳过几道土坎，一头插进汨汨奔流的牛溪河中……

“啊呀！他要自杀。”

我吓得头上的毛孔猛一收缩，脑门上一滴滴热汗顿时冷却，但随即堵塞的汗腺又畅通了。他并没有去投河，而是在补充身体内失去的水分。其实，我也很想下去喝上几口水，又怕暴露了身分，只能耐着焦渴，坐在背坡的一个角落里，远远地监视着他。

这时，许多双赤脚踢着灰土从我身边走下去，纷纷踩进

河水里，杂乱无章的身影挤在常背锅的左左右右，喳喳讲着，哗哗饮着。唉唉，不争气的同盟军啊，在走资派面前为什么就不顾体统，难道存心叫阶级敌人把自己嘲笑？可是，农民们并不觉得和常背锅挤在一起有何不妥；一个满脸毛胡子的人还亲昵地拍拍他的驼背，从怀里掏出包什么东西递给他，常背锅慌手慌脚地把那包东西塞进高帽子里，夹在胳肢窝下，顺着河边，匆匆溜进农科所那道有些歪斜的庙门里去了。

好啊！这个表面看起来可怜巴巴的走资派还满有点手腕。他以为自己做得很聪明，哪晓得我马王爷头上长着三只眼？我把他的阴谋活动如实向队长作了汇报，队长奖赏般地在我肩头重重拍了两巴掌（被他拍打过的部位，到今天似乎还隐隐作痛）：

“要得！小齐，好样的！这才象个工人阶级。走！叫那老小子去现现原形。”

队长是个锻工出身的造反派头头，走路说话都象汽锤锻工件似地噔噔响。他那穿着四十二码翻毛黄皮鞋的大脚才这么轻轻一抬，常背锅住的那间小耳房的门便连着插销被咣啷一声踢开来。

正坐在木板床上不知翻弄着什么的常背锅，吓得倏地直立起身，两只手慌张地往衣服下摆里藏；从破板壁缝里穿进来的一抹斜阳，正巧照在他那惶恐的长脸上。

“手里握着什么宝贝呀，伸出来让我们开开眼啊！”

队长揶揄着，叉开双腿神气地站在背锅面前。

“没、没有哪样。”一双手往衣摆下藏得更深了。

“伸出来!”

一声猛喝，无异于三吨重的汽锤往下砸，我觉得脚下的土地都在打闪（其实是我自己被吓了一跳）。背锅更是脸色苍白，背上的驼峰似乎又往上冒了一寸；颤抖着抽出两手，慢慢地平伸在队长面前。

我很有些失望了。他手中捧着的既不是毒药，也不是匕首（先前，我和队长都心照不宣地认定他手中藏着一个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阴谋），而是十几粒金黄饱满的水稻。

“唔?!”队长鼻子里哼了一声，楞起眉毛望了我一眼。我明白了他的暗示，动手在屋里进行搜查；我找遍了每个墙旮旯，翻乱了一张木板床，其战果便只是压在草席下的一本角边卷毛的《种子学》。队长把那本书信手翻了几页，吓地扔在一边，气得鼻孔连连翕动。逼视着背锅问：

“你的同伙交给你的东西呢?”

“哪、哪个同伙?”

“就是在河边拍你背脊的那个毛胡子。”我出庭作证。

“他给我的，就是这些谷子。”

“当真?”

“要有隐瞒，定我死罪!”

队长抓过几粒谷子，扯一粒丢进嘴里，没嚼出什么味道。不相信地问：

“你，要它做什么?”

“我……我……”一个我字在空中颤悠了半天，尾巴上甩出来个“饿”字。

“呸!”队长将口中的谷壳吐出来，义愤填膺地指着背锅

大骂：“诬蔑！反革命的诬蔑！我们哪顿饭没按定量给你吃？哪一天让你饿着了？你说！你说！！你说！！！”

背锅缩着肩膀，低着头说：“是，我，诬蔑！反革命的……诬蔑！”

队长并不听他认错，把手中的谷子扔在水泥地上，带着凛然的革命正气，用厚厚的轮胎底鞋将那金黄的籽粒碾得象一堆糠灰。

当他那两只翻毛皮鞋在稻谷上旋来旋去的时候，我发现背锅躲在镜片后的两个眼球都快跳出眼眶来了；混浊的目光里充满了痛苦和绝望。汗水在两边鬓角上越聚越密，黑而长的脸上，笼罩着一层死光……当队长怒冲冲地转身走去之后，他也不管我还在场，腿一软扑倒到地下，十个手指捻捻着那堆糠灰似的碎谷，孩子般呜呜地哭起来……

由于这次的越轨行动，背锅被隔离了。但还允许他每天吃饭时出来自由活动一刻钟，坐在天井阶沿上烤烤太阳、换换空气。为了敦促象他那样的“走资派”们早日投降，队长给我布置了一个光荣的革命任务：写几幅有针对性的大字标语，贴在天井四周的廊檐下；让背锅他们天天都触及一下灵魂。我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只半天，便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醒目的大标语贴了出来。

贴好标语，我去请队长来过目，不巧，他进城开会去了。我有些遗憾地走回来，倒背着双手，在小天井里踱来踱去，孤芳自赏地看着自己这笔漂亮的美术字。想象着队长看见了会如何表扬我，“老九们”看了会怎样肉跳心惊。这时，身后传来一阵橐橐橐的敲击声；我回头一看，并没有旁人。

但一转身，那讨厌的声音又响了起来。真见鬼！我气恼地跑到背锅住的那间耳房前，学着队长的样子，一脚将门踢开，头朝内、手指外地训斥说：

“你捣什么乱？看明白了！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是你们反动派的必然下场。”

听着我这严厉的斥责，他并不怎样害怕（欺我年轻？还是看我官小？），反而面带三分笑容望着我说：

“小齐！你……你……错了。”

“我错了？”一股无名火直窜脑顶，我正想以雷霆万钧之势压下他的反革命气焰，他却把嘴往外努努，把声带的频率调到最低处说：

“你写的那个字，错了。”

“字，哪个字？”我一愣，不知为什么，话从口中吐出来会变成一根蛛丝，细得连自己的耳膜也感应不到震动。

“瞧！那个万岁的岁字，你把‘山’字头写成了‘止’字头了，看起来，倒仿一个‘步’字呢。”

啊，老天保佑！幸好队长上县城去了，否则我就吃不完兜着走啦。要知道，在那个大兴文字狱的时代，写错字挨判刑坐牢的人还少吗？我把“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写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万步”这还了得！按三步两公尺计算，一万步才走出去六千六百六十六点六公尺，还到不了七公里呀；人走一个半小时，坐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只要几分钟。这样短命的无产阶级专政宣传家，不是最最凶恶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又是什么？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立即将那个错字撕下来，当场

销毁，换上了一个正确无误的字。麻利地做完这套手术，我心头才稍为松快了些。可并不感到绝对安全。要是背锅告我一状——我昨天为谷子的事伤了他的心，他能不报复么——我还是脱不了爪爪嘛。我心中忐忑不安，连晚饭也吃不下去；想去求求背锅为我保密吧，又擦不下这块脸。狠狠心：管他的！反正没有物证，背锅要告就和他对着干，说他有意陷害。难道队长还会去相信一个顽固不化的走资派？

主意拿定，我倒产生了点阿Q式的乐观了。

晚上，队长回来了。连一杯热茶也没喝完，便赶来检查我的工作；他用电筒四处射了一阵，很高兴地又在我肩膀上奖赏了两巴掌。痛得我咧开嘴笑的时候直想哭。

三天过去了，没事，我悬空的心才又安全地回到了原地。我觉得背锅心地还不错，虽然是个走资派，倒也讲义气，不象某些造反派头头在为自己邀功时那样落井下石。我心里感激他，便在每次打饭时暗暗给他多添半勺（补充说明一下，由于我盯稍有功，又荣任了看守这个职司）。但他对我这种报恩行动竟毫无所觉；饭量反而逐日减少，总是端着碗痴痴地站在天井里仰头望天，把那张消瘦的脸拉得更长了。我为他不懂人情而生气；但看着他每顿剩下来的半碗饭而又可怜他。

这傻角在转什么脑筋呢？

我利用一次向他索取交代材料的机会，问道：“前久，你不是饿得来向别人讨生谷子吃吗？为什么现在给你好好的米饭又咽不下去？”

他躲闪着我不逼视的目光，黑黑的脑门上似乎憋出了一汪

血，半天才结结巴巴地说：

“很对……不起！那天，我、我骗了你们。”

不就是从别人手里收过十几粒稻子吗，有什么必要说谎呢？他慌张得可笑，也诚实得可爱。我打破砂锅问到底，逼出了他的实话：

“那不是普通的谷子，是毛胡子队长选送给我的水稻种子。”

我想起了抄家时从床下翻出的《种子学》，相信他不是敷衍我；又想起了他伏在那堆碎谷上痛哭的情景，心里涌出了一阵激动。但更触动我的心弦的是他的固执。自己都身陷囹圄了，尚不从低头认罪中求得解脱，还想着去搞什么良种培育，岂不是太糊涂了么？

“民以食为天嘛！”他不但不悔悟，反而向我进行宣传：

“我们是个穷县，没有多少工业，吃穿用都得靠这几颗谷子。产量这样低，老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长此下去，如何是好。”

“吁！前几年不是引进过几个新品种，把亩产提高了吗？”在全面占领期间，我翻过所里的几份资料，以半个内行的身分向他提出了反诘。

“对的，”他并不否认。“那些新品种比本地老品种的产量是要高些。”

“这不就解决问题了？”

“不。”他把头摇了两摇。

“哼！只有你是诸葛亮，群众都是阿斗？”我心头的火一股股往上窜。“广大贫下中农都拍手叫好的事，你们走资派总是

看着不顺眼。”

我以为用这把政治锤子一砸，他准服贴得连背锅也不会再隆起的；哪知道他顽固到了发昏的程度，公然宣称说：

“有人拍手；也有人摇头。”

“你——反动！”我重重拍了下床板。

他吓得缩下脖子，两眼又失去了刚才和我辩论时的光彩，变得和原来一样灰濛濛的了。我又有些可怜起他来；因为他毕竟没有杀人放火，只不过有着一一种书呆子的固执。我口气放得柔和了一些，问他：

“你说，你刚才的话是不是反动？”

“是……是反动，”他顺嘴答应。忽又抬头望了我一眼，眼窝里闪出了两点泪光。

“可我，不是为自己……”

奇怪的逻辑！还不等我的批判稿在肚子里酝酿成熟，他又抢先向我进行反宣传了：

“那些新品种好是好，可每年都要派许多车子、许多人出县、出省去拉，那笔花费能买好几十万斤谷子呢。还有，新品种大都不耐病。我们这里，有史以来就是个稻瘟病的老窝子，气候稍为反常点，水稻就大面积‘泡呛’，造成不少地方失收。把丰年和歉年拉扯下来，总产量也和原来的老品种差不了多少。再说，新品种又多是矮秆，编不成席子……”

“编什么席子？”我听他前边说的还有些道理，怎么越往后越不象话了。

他指指我坐着的木板床：“就是垫在你屁股下的这种。”

我又在心里哼了一声：拿我当傻瓜呀！席子我还不不懂？